

中国文学 与日本文学

(日) 铃木修次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

〔日〕铃木修次 著

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

文学研究室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

〔日〕铃木修次 著

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
文学研究室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875印张 3插页 133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70

ISBN7-80534-134-4

I·126 定价: 2.15元

中日比较文学的可喜收获

——代译者前言

赵 乐 铨

由于中日两国文学的特殊关系，日本学者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年深日久，人多、面儿广、著作多、成就也大。然而，自19世纪初叶比较文学传入日本以后，他们在这个领域，主要偏重于对欧美文学的比较研究，对中国文学却多止于考证。二次大战以后，虽然研究范围有所扩展，但这种倾向依然存在。而且，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主流仍然在于欧美文学方面。这在日本斯界一些有识之士也曾提出过意见。如金原理教授认为，日本现有的比较文学组织和刊物，“研究的主流皆倾向西方”^①，因而，希望加强日本的古典与中国、朝鲜半岛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佐山济教授在研究中日诗歌关系时主张“无论如何，我们要探讨彼此的内在关系……，仅仅就中国诗歌的影响作平面的考查、比较，指出语句的相似和启示等工作，看来是无济于事的了”^②。

当然，比较文学中存在各种流派，不过，就中日比较文学而言，仅仅囿于两国文学间的考证的、平面的、微观的研究，对了解两国的历史和现状，或者展望其未来，虽然也必

①金原理：《和汉比较文学研究史管见》，1986年。

②佐山济：《古代和歌与汉诗》，1959年。

要，但却是不够的。我们以为，必须在影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平行的、立体的、宏观的研究，才有助于从基本观念到表现方法，透彻地理解两国文学。

铃木修次教授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就是这样，就一些有根本意义的主要问题作了比较研究，而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一

在这部专著里，作者首先就中日两国文学观的差异作了比较研究。他明确指出，中国最早的文学观以为“理想的文学态度和文学观，应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那就是即使是政治问题也不回避，而要积极地干与”。中国传统的“风雅”精神，就“寓于‘讽刺’（政治批判）之中”，就是说，“中国第一流的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性，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而日本文学认为“‘愁物宗情’^①的情趣才是重要的，如果把政治纠缠于文学之中，那会流于庸俗，这种倾向是很强的”，因而，表现出一种“非政治主义”（超政治性）。于是，他紧紧扣住这一点展开论述。他以历史上的著作，如《史记》、《汉书》等，以及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作品，论证中国文学的“经世”精神。还以对《文选》和《玉台新咏》评价的不同，《游仙窟》在中国的失传作为例证。他说，到了近现代，不论是梁启超、鲁迅或者毛泽东，“以文学

①“愁物宗情”（原文为“もののあわれ”或写作“物の哀”）是由于外界事物而触发的一种幽深、细腻、优美的感受和情趣。

为‘经世’的重要工具这一思想”都是一致的。虽然在文学史上也曾出现过王维的“穷幽极玄”的诗作和“神韵说”等等，但他认为“贯穿于中国文艺思潮的主流乃是‘格调’的精神”。而日本人的文学爱好则不同。如白居易的诗歌，日本人喜爱的是他的闲适诗、感伤诗，如《长恨歌》等，而不是他们代表作讽谕乐府（如《秦中吟》、《新乐府》等）。他还指出，中国的“讽刺”是以“更多的直言作为宗旨的，因而往往过于认真，缺乏笑的因素”。由于以“直叙社会现实的作品为最佳”，古来幻想和虚构的作品，如小说则不被重视，遂有“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讥。而日本人则重视物语的趣味性和价值。他说，“在日本，一提到‘讽刺’，如果没有嘲弄的精神，游戏的心情，滑稽的姿态”就毫无兴趣可言了。作者以为：日本文学“似乎一开始就是脱离政治的”。

总之，两国的文学观不同的关键在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点，使中日文学在一系列的价值体系里出现了差异。他从审美的角度指出，日本人在色彩、味觉等方面偏于浅淡，而中国人则偏于浓重。在文学上，“中国人的传统爱好集中于‘风骨’里。‘风骨’的精神，与中国的‘风雅’，‘讽刺’、‘风流’相结合，形成中国文学巨大的价值体系，”“把握住‘风骨’就抓住了中国文学的主要趣味倾向”。而日本文学的主要趣味倾向在于“愁物宗情”。在日本文学中，“作者的意志表现得暧昧亦无妨。唯有情绪，唯有‘愁物宗情’之心才为重要”，好的文学作品就要“深刻、细腻地写出内心的情绪和感受”。他认为，这是外国人很难理解的。中国文学主要以“富于理性，语言明快，刚毅雄健，面

对政治和社会现状也不避讳，敢于光明正大地批判而坚实有力”为佳作，属“男性世界的文学”。而日本文学，注重动荡的情绪，“更注重腼腆、娇羞、文弱等情感”，属于“感情纤细而敏感的女性”世界的文学。两种文学具有同等价值。这些本质上的差异，也就产生了表现上的不同。日本诗歌总是“抒发毫无思想脉络的情绪”，而中国诗歌则偏重于思想、人生观；日本诗歌多不作解释、说理，只求感受上的共鸣，而中国诗歌则总是说明的、说理的，“只表现情绪而不接触意志的文学，不能视为优秀的文学。两国散文的笔法也有不同。中国的散文，常爱具体形象地交代明确，如“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日本的散文（小说）则从朦胧中制造气氛，不明确交代，催人思考，如“我边攀山路边想”（夏目漱石：《旅宿》）。中日小说观不同，趣味倾向也各异。日本人偏爱暧昧、含糊、幻晕而追求幽玄；中国人偏爱简洁明快，而反对真假含混。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论述两国文学的差异时，作者并非做静的描写，他极力地从发生发展做动的，也就是史的比较和论述。如中日文学中的“风流”观，日本虽接受中国的影响，但却有各自的发展趋向。在中国，“不落常套才是风流”，而在日本，“落于世俗风流常套”才是风流。再如“无常”，作者从诗经、楚辞到老庄，以及佛经，比较了中国的无常感、佛家的无常观和日本的无常意识。细致的比较，使读者既看到了彼此的联系，也看到了区别，可以说做到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是颇见功力的。

再次，在比较研究中，既有明确的理论观点，不堆陈罗

列，又有翔实的例证，不落空泛，如对“风雅”的论述即如此。粗心者常以为两国所用的汉字相同，意思当必一致。其实不然。他以丰富的例证，说明中国的“风雅”是“把政治问题放在个人生活范畴里来加以领会的是‘风’。把人类社会问题同政治联系起来加以理解的是‘雅’”。而日本的“风雅”，“首先要想到‘典雅’和‘消遣’，其次要想到追求游离于人生的美的世界的心情”。中国的“风雅”首先考虑政治观念，其次是“古典美”。作者以此推论开去，提到日本民族接受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来，再用食品、衣著、色彩、味觉等方面的实例，证明他们“淡化”外国的东西，然后加以接受的民族特点。这也是一种“咀嚼”和“消化”。这种写法，有理有据，说服力较强。

铃木先生是一位知名的汉学专家，对本国文学自不待言，对中国文学是修养极深的，因而挥笔议论左右逢源。这也是这部书取得可喜收获的原因之一。

二

这部著作涉及的问题较多，和我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但这未尝不可以视为日本学者关于两国文学的一次表态。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正是为中日比较文学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在日本文学史上，就其主流而言，所谓“超政治性”的现象，确实比较明显，这也是本书所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作者在第三章里，专门讨论了它的形成原因。他首先以为这

里由于从事文学的阶层不同，因而，关于文学的功用有不同的见解的缘故。他指出日本从事文学的阶层：古时是宫廷女官、法师、隐士、市民。这些人都是政治的“局外人”，他们的“游戏精神”，使他们“超政治”；而中国从事文学的是士大夫，即官僚和知识分子，都是政治的“局内人”，因而不“超政治”。作者觉得，这样“虽大体上可以理解，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有问题”。于是，他从遣唐使的情况加以探讨，指出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进中国的政治制度（律令、组织、制度等），也就是说，虽然也引进其他（如文学、宗教等），但主要是为了政治。因此，就有“严格的选择和控制”。在这里，作者谈到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情况，不妨多引一些，以供参考。

比如遣唐使船装了《孟子》，就有些人嘁嘁喳喳地说它是会使那只船沉没的不祥之物。这话是有象征性的。不言而喻，这是由于《孟子》一书中有的地方谈到革命合理性，这与天皇制是不符合的。从这一点来思考，也可以认为，遣唐使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是严加警惕的，安置了严格的过滤器，监视了向日本的引进吧！

就文学来说也是一样，派遣唐使的时代，杜甫的诗几乎没介绍到日本，白居易的诗也受到了限制，对他的闲适诗与感伤诗虽作了较多的介绍，但讽谕诗却很少介绍。可是与此相反，象《游仙窟》这类与政治完全无关的软文学，却被引进而加以珍视……

不要引进政治问题的警惕心理，不久对政治上的言论，哪怕是文学领域里的，也使日本文化界人士产生某

种变态心理反应，其结果，在日本形成了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文学。

作者又以为，当时日本的抒情诗歌形式已然形成，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倾向业已存在，因而觉得遣唐使起码是非本质的原因。“大概不是人为的限制规定，而是他们（遣唐留学生）本来就不喜欢、不关心政治色彩浓的文学”。于是，作者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连雨江涨》（苏轼）和芭蕉的俳句：“秋风袭芭蕉，夜听雨敲盥盆”比较，相同的题材，杜甫由己及人，谈出理想抱负；苏轼眼中是人民的疾苦：“人随鸡犬墙上眠”；而芭蕉“却丝毫不想国家社会和政治，只一心一意地在落进水盆的雨点上寻求‘风雅’的情趣”。作者倒把这一情况，归结为“日本人的一般爱好”。

日本古典文学中的所谓“超政治”倾向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不过，我们认为，在诸多原因之中，日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应该是其中的主要原因。首先，在大和朝廷一统日本天下之后，没有类似中国的朝代更迭和“英雄五霸闹春秋”的局面。虽然中间也有过政治上的争斗，如武家的夺权斗争等，但基本上是天皇与神道、武士与刀剑的专制主义绝对统治，而且，上层统治集团既是政治利益的维护者，又是文化领域的垄断者。他们在政治上既不容许异己力量的存在，在文化方面也就扼杀了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命运关心的权利。中国文化一经传入日本，就被纳入天皇统治的轨道。垄断文化的贵族，按照他们的政治利益创造自己的文化。这从《古事记》的编纂情况可以看到。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本身

来沿波讨源，这种倾向也不是一开始就出现。《怀风藻》因是汉诗集也可以说是例外。《万叶集》里就可以看到关心政治、社会和人生的现象。到《古今集》歌风为之一变，基本上和我国的《玉台新咏》一样，成了一部艳诗集（起码和《万叶集》比）。此后盛行不衰的“歌合”（赛歌）又助长了这种风气。不问政治的歌风，对文学其他领域便一直影响下去。这和藤原氏的专权，贵族阶级精神世界日见颓废，只在风花雪月、胭脂粉黛中讨生活，以标榜“风雅”不无关系。再者，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作品，在古代印刷条件的限制下，也必然经过统治阶层的政治筛选，看不到更多的平民的作品，看不到不同政见者的作品，也会使我们的判断受到影响。至于从事文学的阶层，没有“骨横朔野，魂逐飞蓬”等经历，自然是止于“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中弄文低吟，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在政治上这自然也安全。至于读者，“焦大不爱林妹妹”怕也是必然的。这些情况，在江户文学，尤其是以后的近现代文学中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我们以为，在涉及“超政治”倾向的成因时，这些情况和因素是应在考虑之中的。尽管作者一再谈到他是从古典传统着眼，就两国文学的主流进行探讨的，但象有的人那样，归之于民族性、地域性、风景气候、长治久安、血缘社会等，是值得考虑的，尤其是作为主要原因，如果想到朝鲜文学，放眼世界文学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这些粗浅的想法，也可能只是中国人的一种见解。

不过，作者说：“日本人一直是在过于超政治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易于陷入这样的想法，即文学本来就与政

治无关，对文学来说 政治是无缘的存在。而且容易误认为文学一开始就和政治无关。然而若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来看，这完全是误解。”他认为“超政治”“决不是文学具有的本质特征”。这表明了他关于文学的基本观点。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确是一项比较艰巨的工程，有待我们两国人士的继续努力。铃木教授指出，发掘中日两国文学的不同，“怎么不同？为什么不同？思考这些不同，中日比较文学论便真正开始了”。

三

总之，《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有些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如谈到“幻晕嗜好”时，离开了美的表现和审美情趣的差异，而归之于古来日本人对汉字（语）的理解缺乏信心，因而喜爱朦胧模糊等等。但本书的成就是巨大的，鼓舞人心的。这不仅因为书中有许多卓越见解，而且，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一、中日文学的特殊关系，要我们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通过影响研究，找出两国文学关系的来龙去脉。这部著作虽然也有影响研究，但却没有为考证而考证的烦琐倾向。作者成功地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结合起来。二、要深入开掘，抓住具有本质意义的问题，从现象到理论，通过异同的比较，加深彼此的了解。三、文学现象和社会历史密不可分，要弄清其发展变化，就要紧紧地掌握历史唯物论的武器，来理解和处理我们的文学遗产。四、放开视野，多角度地进行比较研究。中国文学与朝鲜文学、越南文

学的关系，会对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 提供有力的参考，必要时还要放眼世界，避免一“孔”之见的束缚。五、加强两国人士的成果交流。东坡居士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种感受不止是作者一人。互相交流看法，尽管是各抒己见，但经过切磋琢磨就可以弥补“当局者迷”的遗憾。

友谊的基础首先是了解。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将对中日友谊的增进有所贡献。我们希望深刻地了解日本文学。作者提示我们要再读《源氏物语》。但我们觉得，要消除互相感觉、对方文学乏味的偏见，还有更好的措施，就是要象铃木先生，多写些《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这样的好书，从理性上加深我们对彼此文学的理解。这也是我们翻译此书，向中国读者推荐的目的。

中文版序

拙著《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于1978年出版。发行后不久，听说已成为中国方面迅速开展起来的比较文学的参考书，而广为利用，心里委实感激得很。最先提供这方面消息的是复旦大学的苏德昌教授。

作为一名中国文学专业的研究人员，看到日本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感到对中国文学的本质认识不够深刻，因此，就把成为拙著基础的原稿，在东京书籍出版公司发行的《国语》月刊上连载发表。连载结束，有幸蒙该公司出版了单行本。

这次，想不到由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刘柏青先生和该大学日本研究所赵乐甦先生的努力，这本书又能译成中文出版，实在是高兴已极，不胜感谢了。

面临21世纪的即将到来，为了中日友好的日益加深和世界文明的繁荣，我想，我们必须彼此作出贡献。而中日两国文学的传统思想，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存在着颇大的差异，因此，我想今后要彼此互相理解这种差异，从而，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增进。

向从事翻译的各位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铃木修次

1986.12.12

(赵乐甦 译)



作者像

目 录

中日比较文学的可喜收获

——代译者前言·····	赵乐甡	1
中文版序·····	铃木修次	11
一 文学观的差异·····		1
二 “风雅”与“讽刺”·····		13
三 日本文学的超政治性·····		31
四 日本的抒情与中国的抒情·····		40
五 “风骨”与“感物宗情”·····		50
六 日本人的艺术意识·····		68
七 幻晕嗜好·····		78
八 “风流”考·····		100
九 “无常”考·····		158
十 经世与游乐·····		184
后记·····	铃木修次	204

一 文学观的差异

我们常常从各式各样的人那里听到这样一种不满意的说法：中国现代文学实在太乏味了。他们还说，特别是《文艺讲话》之后的中国文学尤其枯燥无味。所谓《文艺讲话》，确切地说，即毛泽东于1942年所做的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这次“讲话”提倡政治优先于艺术，所以人们总爱推想中国文学之所以变得衰萎乏味，似乎由于这一主张。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事实确是如此，那么《文艺讲话》以前是否就有能使日本人的爱好得到满足的文学作品呢？

诚然，郁达夫的《沉沦》是一部日本人也比较欣赏的作品。但那是以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为蓝本的模仿之作，这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常识。就这个意义来说，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处于特殊地位，因此，难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典型。

鲁迅自己曾说，他在日本时，为了学习文学，阅读过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一些作品，但他丝毫没讲他是怎样理解漱